



中国考古学

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张忠培 著



科学出版社

K87-53

1

科学技术类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张忠培 著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 张忠培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03-012802-8

I. 中… II. 张…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560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改

整体设计：李 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安春生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Zhongguo Kaoguxue: Zoujin Lishi Zhenshi Zhidao

张忠培 著

科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sciencecp.com>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编：100717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ISBN 7-03-012802-8

定价：30.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 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 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 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 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 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 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 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晟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鄢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

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

序　一

自 1994 年至今 5 年间，我仍未实现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却写了《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聚落考古初论》、《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等 9 篇文字。现将其和曾收在《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一书中的文字，汇集成了这本册子。

这本册子中的曾集在《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的 15 篇文字的写作、发表等情况，在原书的“序”及各文后的后记中，均作了说明。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将原书的“序”保留了下来，是为本书的“序二”。收在本书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和《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两文。前者，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一书写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后者，我在该文的文后作了点说明，现需讲清楚的是，我之所以能有机会和吴怀祺、王晖等三位朋友聊天，是他们受了白寿彝先生的委托，而这篇文字是王晖同志整理出来的。白老已 90 高龄了，是老一辈史学家，是我的导师苏秉琦教授的老朋友，他们之间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他为人敦厚，在中国史学的广泛领域中均做出了影响

深远的贡献。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学步集》，但一直无缘获得面教，然而，自1990年我跟随秉琦师面见白寿彝先生至今，一直得到他的关怀与爱护。他委托吴怀祺等三位朋友对我所作的这次访问，无疑是对我的又一次抬爱。藉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再次表示对白老的深切感谢。我也感谢为整理这篇谈话记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王晖同志。收在这集子中的其余7篇文字的写作或发表情况，均在文后有所说明。

道者，道路、道理、方法也。收在本书的24篇文字，基本上涉及到了中国考古学以往走过的道路，今后该走的路，考古学是什么样子的学科，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何以层位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层位学、类型学，怎样通过遗存及其与时、空的关系探讨考古学文化，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研究历史，考古学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接近历史真实等等问题。总之，讲的无非是考古学之道。考古学之道，远非一道。何者是正道，检验的标准，只能是新的实践；道法之高低，则视在等量遗存中吸取信息多少及其精确程度而定。我讲的考古学之道，虽源于实践，也被一些实践检验过，然而，这检验并未终止，所以，这道是否正确，以及水平的高低，仍待新的实践检验。为此，我将已写的文字，集中一书，并名之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张忠培

1999年2月于小石桥寓所

序二

几年前，一些朋友建议我编一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我虽感兴趣，但觉得主、客观条件仍不成熟，直到1993年春，才决定做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拟收进书中的论著目录。这年9月，在郑州西山考古工地将这个目录征求先后提出此建议的诸朋友意见。1994年3月，在他们的催促和帮助下才把现在名之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集子编成。

这本集子共收集15篇文章。其中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和《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三篇，分别是和黄景略、俞伟超及马淑琴合作写成的。无疑，《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和《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虽把我处于作答的地位，其实也是我分别和徐天进、水涛、宋新潮、赵化成、周星、何努、李水城、李卫东以及贺云翱、谷建祥等朋友共同合作的产品。陈雍及李伊萍协助我作了《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的整理订稿工作。《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安徽省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据我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成初稿后，再由我改写成的。此外，田建文作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及《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笔记，并整理成初稿。为编此书校读这些文章时，我和他们以及促成、帮助我结集的那些朋友交往、合作的情景，再次从脑中浮现出来，往返于记忆中，终究难能消失。

诸文校读情况，分为三类。一类，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地层学与

类型学的若干问题》等等，校读时，只字未动，这类占大多数；二类，这类数量较少，如《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等，只改了一些文字，原意未改；三类，只有一篇，即《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与文物》发表此文时，编辑部未曾和我们商量，即作了较多的删改，影响了一些原意，故这次依原稿发表。

结集的这些文章，也可大致分为三组。一为通过对梁思永、苏秉琦及夏鼐诸前辈的学术著作的评论，即试图从史的角度论述理论、方法。研评历史，离不开从今往前看，实则也是一种古为今用。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对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我很想就李济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论。至今，我基本上只读过他在大陆时发表的文章。他在1949年后于台湾发表的论著，我读的很少。故此，对他作些评论的愿望，终不敢付之实施，这是颇为遗憾的。二是直接谈理论、方法的。讨论的范围，大致包括：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何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如何运用这类问题，等等。理论、方法的可贵性，在于它的实践。我的讨论，面对现实，参与了考古学当前问题的讨论。三组，只有二篇，内容较杂。其主要内容，也涉及到了理论与方法。总之，这些文章是从中国考古学以往和当今实践进行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故将这集子取名为《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结集的动机，一是参与理论、方法的讨论，向同行请教，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学当前及今后一定时间内的实践中起点作用。总之，是为了引玉才抛出这些不成型的砖块。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先后分别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的课程。边研究，边授课，同

时又将认为有些心得且适时的讲义，撕了下来，整理后发表出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迫于朋友索稿，也写了两篇。1989年下台后，自己选择的主要任务，是还经手过的田野考古工作所欠下的《报告》债。但是，考古学问题讨论的诱惑，朋友们的催促，使我尽力压下的将讲义整理成《考古学方法论》一书的愿望，时时浮了上来。《报告》债不还清，此书不能写，这是我既定的决心。于是，当压不住那浮上来的写《考古学方法论》的心愿的时候，又动起笔来，写了四五篇，以应付自己认为的当前考古学形势的需要。这就是写这些文章的大致的来龙去脉。现在把它们集结起来，仍然是我在可以预计的三四年内写不成《考古学方法论》的缘故。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即听听同行们的批评，吸收意见，可用于日后写《考古学方法论》。

集子中的文章，写作的年代跨度，约有十多年。这期间的认识，我是有些变化的。如写《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时，是使用“地层学”一词，表示当用“层位学”这词才能表述的内涵，尽管当时已自发地感到此方面的问题，并在此文中已萌生了这一思想，但直到后来写这类文章时，才径直使用“层位学”一词。又如写《浅谈中国考古的现在与未来》一文时，还认为“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建筑考古”及“农业考古”，是涌现出来的新学科，随后写的文章中，对这些认识至少是提出了质疑。还如我曾经接受一般流行的认识，把“历史”，有时甚至是“遗存”，当成了考古学研究对象，直到写《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时，才基本上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当然，还不止这些。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仅是说明自己认识的一些变化，同时，也是为向读者声明：如果看到这类矛盾的话，请以较后发表的认识作为我的观点。为此，我在每篇文章的后面，写了发表的时间，有的还说了成稿的日期。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

干问题》发表后，我才认识到要讲清层位学及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必须先说明考古学研究对象以及什么是考古学，而要讲清考古学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考古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这样，我又接着先后写了《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等几篇文章。尽管我讲授过《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论》这类课程，发表的文章又是在这基础上写出来的，但发表之后，还感到仍存在如上所说的问题。显然，无论是授课，还是后来写文章时所做的研究，仍是一个由表入里、自点到面，甚至是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看来，我对本书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仍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思考，仍处在颇不自觉的，被探讨的问题的内在逻辑牵着鼻子走的认识阶段。

从中国考古学的丰富的实践中，去探索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这一认识的取得，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49年以前，这个学科在实践中已摸索出一些适用于实践的技术、方法、理论，但这蕴藏在实践中的理论、方法，还未曾被人们从实践中剥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简单说来，可大致作如下概括：50年代前期，热衷于学习前苏联，把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定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轻视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当然就忽视从这实践中去探讨理论、方法。到1958年，把层位学，尤其是类型学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之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为教条，全面否定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从70年代后期始，以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论为起点，开始回归到正确的轨道，然而，自80年代后，又遭到从西方传来的“新考古学”的

干扰。曲折与干扰，形式不同，实质则一。问题出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透物见人，还是搞从人见物，即从论到史；二是是否重视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去探究考古学理论、方法。我们应坚持主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探索透物见人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古代除曾存在过相当发达的基本上属内陆文明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连绵不断，即史的过程的完整；二是多元一体，即史的多样性及其联结性。同时，当前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城镇化，破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从这古、今中国环境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不只是仍处在蕴藏状态，已相当程度地裸露出如下引人注目的情景，即：研究工作规模巨大，和遇到的遗存丰富、多彩且具自身特色外，还存在时、空的连贯与联接性。正确的理论，是人们对所研究的客体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认识；科学的方法，便是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新实践的途径。实践是理论的丰富源泉，因此，作为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在中国考古学已具备上述客观条件下，完全可以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坚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寻找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能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也可能对世界考古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我们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主要着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探寻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当善于吸取适用于中国的境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中国考古学者应本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勇敢地站立起来。

（该文成稿于1994年4月16日，是为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写的序言，今将其中的聚落考古的内容删去后，再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

——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 70 周年纪念 (1)

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

——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 50 周年 (6)

中国考古学路上不会消失的足迹

——悼念夏鼐先生 (18)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 (26)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 (47)

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拓者

——沉痛悼念恩师苏秉琦教授 (54)

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60)

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 (73)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 (78)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 (102)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125)

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148)

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152)

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 (162)

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 (177)

聚落考古初论 (199)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的检讨	(205)
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11)
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	(218)
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	(226)
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	
——答《东南文化》记者	(241)
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	
——《史学史研究》王晖访谈记	(265)
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	(283)
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	(302)